家庭與生命倫理學中的文化危機

王　玨

恩格爾哈特(H. Tristram Engelhardt, Jr.)教授的文章出人意料之處，在於它把當代生命倫理學話語體系中，多少顯得陌生和突兀的主題——家庭——上升為討論的中心：如標題所示，家庭既被視為塑造生命倫理學形態的中心議題，也同時被指認為製造分裂的關鍵爭議點。與其立場的突破性相應，這意味著讀者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努力去理解其思想意義。筆者不揣淺陋，願就所見一點線索，嘗試剖析此文的深層理路及現實相關性，以為拋磚引玉之用。具體而言，筆者將集中探討家庭所負載的文化危機/文化戰爭的意義，並以此為背景，思考家庭在當代生命倫理學建設中應該扮演的角色。最後，本文將提出一種跨文化的對話模式，作為解決危機的可能出路。

1. 無父時代的降臨

倫理學探討不應當停留於抽象理論，而必須深入到生活實際當中，因為倫理學承載著人們對生活之道的思考，塑造著我們不得不置身於其中的道德環境。雖然道德環境無聲無息，但這並不意味著它的實在性不如可見的物理環境，相反，通過引導我們的行為，它直接影響著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生活的命運。家庭在現代生活中的遭遇就是很好的例子。恩文的首要目的就是揭示當代西方社會長久被忽略、被壓抑的事實，那就是自由主義推崇個人權威是以破壞傳統家庭結構為代價的。

王　玨，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講師，中國湖北，郵編：430074。

《中外醫學哲學》XI:2 (2013 年) ：頁 129-134。
© Copyright 2013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恩格爾哈特首先論證了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對傳統家庭的破壞是根本的、結構性的。當自由主義將個人同意設定為家庭形態的唯一基礎時，它實質上已經模糊了家庭與其他社會聯合之間的界限，它鼓勵個人自由選擇任何喜歡的伴侶和生育模式，包括同性家庭，婚外生子，單親養育等等。這種自由主義的家庭觀表面上賦予了個人更多的選擇與自由，然而從長遠的效果看，卻是陷個體於孤立無援的狀態。

具體而言，自由主義的家庭觀及其實踐已經在如下幾個方面將現代人剝得赤身裸體。(1) 在美國和歐洲，越來越多的兒童（2009 年美國的資料是 41%）出生於婚外關係，由單親（通常是單身母親）養育。統計資料已經表明，對孩子而言，單親家庭意味著更少的經濟支持，更大的吸毒和犯罪機率。(2) 被拋出傳統家庭之外的個人發現自己不僅未能獲得更大的自主，反而變得更脆弱、更易被外在、偶然的力量擺佈。譬如，自主主義家庭觀將重點放在個人的自我滿足與自我實現，卻缺乏對實現自我方式的任何實質理解。相反，傳統的家庭觀對家庭角色卻採取了富有內容的存在論／ 形而上學的理解，強調個體只有將自己融入關於整個家庭的敘事中去，才能贏獲真實的自身，並且這敘事在時間跨度上遠遠超過個體當下這一代。以這方式，家庭被構建為具有自身完整性、自主性和道德地位的獨立實在，這實在不僅始終庇護和支持著個人的發展，而且在個人與國家之間構築起一層有益的保護帶。與自由主義試圖將家庭還原為僅僅私人的親密關係不同，傳統家庭性質上更接近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意義上的美德共同體：家庭成為培育德性、積累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經濟資本(financial capital)的首要場所。(3) 傳統家庭的衰落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留下危險的真空地帶。隨著家庭的退場，孤零零的個人開始直接面對國家，其結果是福利國家對私人領域的危險傾入，以及個體對官僚制度(bureaucracy) 的過分依賴。然而，福利國家能否取代家庭的功能仍然是疑慮重重的問題。

有鑑於此，以類似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的風格，恩格爾哈特發人深省地將當代標示為“父親死了”的時代。正如通過宣佈“上帝死了”，尼采並不是要討論抽象的邏輯問題，而是宣告突然降臨在人類頭上的災難。恩格爾哈特同樣試圖警醒人們，自由主義的“後-傳統家庭”時代可能暗含了巨大的社會、經濟和道德成本；更為危險的是，當代西方主流的世俗道德既對這成本缺乏清楚的認識，也缺乏應對相關危機的手段。

2. 生命倫理學中的文化危機

自由主義“後-傳統家庭”的文化危機同樣波及與之相關的生命倫理學領域。如恩文所分析的，不論是在醫療決策、未成年人地位，還是在醫療資源的籌措配置上，基於自由主義的當代西方生命倫理學的理論與實踐都陷入了困局。最現實的例子就是由社會-民主制福利國家的醫療資源配置方式，所引發的財政不可持續的危機。按恩格爾哈特分析，這危機同時伴隨著巨大的道德、人口和政治風險[1]，因而是整體的文化危機。

如果恩格爾哈特的診斷正確，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當代西方生命倫理學能夠憑其自身克服這危機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因為當代以西方佔主導地位的生命倫理學本身，就是危機的組成部分。譬如，以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為導向的醫療決策模式和醫療保健制度，均在實踐中進一步加劇了傳統家庭架構的瓦解。

然而，如果追溯歷史的話，我們發現當代生命倫理學與文化危機的關係要比表面上看更複雜。不應忘記，上世紀 70 年代當生命倫理學誕生於美國時，它本身就是回應文化危機的努力的產物，特別是回應當時美國文化中特有的道德真空，此一真空的複雜成因包括西方主導文化的世俗化、個人主義的日益強大，以及傳統社會權威

(1) 恩格爾哈特：〈走向中國生命倫理學——重審後基礎之醫學道德〉，載范瑞平編，《中外醫學哲學》，第 x 卷，第 1 期，2012 年，頁 13。〔H. Tristram Engelhardt, Jr., “Towards a Chinese Bioethics: Reconsidering Medical Morality after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ed. FAN Ruiping, X:1 (2012), p.13.〕

的式微。[2] 艾伯特．瓊森(Albert R. Jonsen) 也從另一角度針對同一現象指出：三十年前，所有的生命倫理學都是外行人，都是陌生人，致力於批評現行的制度。[3]

這一歷史事實提示我們，不應奢望沒有危機的文化，相反，文化健全與否恰恰表現在它有沒有能力感受、識別及應對自身內部的危機。反過來說，文化上最大的絕症莫過於喪失這感受危險的能力。當代生命倫理學恰恰是在這個方面失去了敏感，違背了它誕生時的精神。如瓊森敏銳地指出，當代西方生命倫理學已經變得越來越無聊，因為它變得越來越馴服，禁錮於既有的理論框架，滿足於預設的議題，而不能有效地反思自身的理論前提。

這背景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理解恩格爾哈特文章的重要性。通過聚焦於家庭，恩格爾哈特不僅僅要重新發現久已被壓抑的生命倫理學議題，更重要的是突破既有禁錮，開闢新的視角，從綜合的、文化整體的高度，揭示當代西方生命倫理學話語方式的局限。這思想努力既是對危機的診斷，也同時是克服危機的開始，其價值是不容置疑的。

3. 面對危機，中國生命倫理學能做什麼？

在看到當代西方的文化危機之後，中國生命倫理學面對的關鍵選擇就是：我們是否必須擁抱上述自由主義的道德體系，重蹈西方的覆轍；又或者我們另有選擇，通過重新審視植根於本土文化的中國生命倫理學資源，突顯那些富於內容的尊重關係、情境與傳統的道德特質，以應對當前圍繞著家庭的危機，而為中國社會改變命運。這也正是恩文結尾在文化戰爭(cultural war) 名義下所突顯的選擇。

就這種選擇的性質與背景而言，“文化戰爭”或許並不是最恰當的名稱，也不應當成為選擇的最終結局。以恩文本身為例，恰恰

---

(2) 恩格爾哈特，“走向中國生命倫理學”，頁 15。〔Engelhardt, “Towards a Chinese Bioethics”, p.15.〕

(3) Albert R. Jonsen, “Why Has Bioethics Become So Boring?”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25:6 (2000), p.691.

是因為他將東亞部分國家的文化和倫理實踐納入考慮之中，恩格爾哈特才能提出這種基於文化戰爭的選擇。這樣理解“文化戰爭”實質上是基於差異的跨文化對話，並以此方式成為文化建設的本質部分。如前所述，向着異己開放，到陌生的文化與領域旅遊[4]，是文化能夠意識到自身局限性，從而更生自身，克服自身危機的必由之路。這構成文化建設的普遍模式。如果落實到中國生命倫理學建設，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寶貴啟示：

(1) 當代中國生命倫理學建設應當以本土文化為本位，而不應盲目地接受任何所謂“高級”文化的植入。西方當代自由主義道德與生命倫理學的危機已經表明不存在普世主義的道德體系，相反，有效的生命倫理學必然是植根於具體的社會歷史視域，並依據於後者而得到評價。(2) 雖然生命倫理學應當首先被看作是本土文化建設的一部分，但跨文化對話也是任何生命倫理學建設始終必須置身於其中的重要視域之一。如果離開了他者文化的刺激和啟發，生命倫理學的話語體系很容易變得封閉、無聊，並缺乏反思自身危機的能力。譬如，雖然現在東亞社會的醫療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為個人主義所侵蝕，並嚴重危及家庭的完整，但只要仍然有相當數量的傳統家庭存在，代價就仍然是隱藏而難於估量的。在這方面，西方已經迫在眉睫的危機就可以對東亞社會起到重要的警示作用。至於東亞一些基於傳統家庭而運轉良好的制度，比如新加坡的家庭醫療帳戶制度，對西方而言也是有益的提醒，提醒他們放棄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東西方可互以對方為思想實驗中的自己，從中拓展視角與想像力，從而更好地認識自己，並慢慢醞釀出對危機的可能對策。(3) 重要的是，始終記得建設生命倫理學不只是擁抱某些原則，某些道德話語體系，更關鍵的問題是回答“我們希望成為何等樣的人，希望將來生活在怎樣的世界中”。只要人仍然是以有身體的，有性生殖的，有限的方式存在，那麼家庭就是回答這些問題的根本視域，並因而

(4) Jonsen, “Why Has Bioethics Become So Boring?”, pp.689-699.

是生命倫理學討論中不可繞過的中心話題。在我看來，這就是恩文題目的背後邏輯，也是他這篇文章帶給我們的最大教益。

參考文獻

恩格爾哈特：“The Family: Crucial to and Divisive in Bioethics”，載范瑞平編，《中外醫學哲學》，第 XI 卷，第 2 期，2013 年，頁 113-127。〔Engelhardt, Jr., H. Tristram. “The Family: Crucial to and Divisive in Bioeth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ed. FAN Ruiping 范瑞平, XI:2 (2013), pp.113-127.〕

恩格爾哈特：〈走向中國生命倫理學——重審後基礎之醫學道德〉，載范瑞平編，《中外醫學哲學》，第 X 卷，第 1 期，2012 年，頁 11-27。〔Engelhardt, Jr., H. Tristram. “Towards a Chinese Bioethics: Reconsidering Medical Morality after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ed. FAN Ruiping, X:1 (2012), pp.11-27.〕

Jonsen, Albert R. “Why Has Bioethics Become So Boring?”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25:6 (2000), pp.689-699.